

范鹏 总主编

陇上学人文存

郑文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陇上学人文存

郑 文 卷

郑 文 著 尹占华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019844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郑文卷/范鹏总主编; 郑文著;
尹占华编选.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26-04331-8

I. ①陇… II. ①范… ②郑… ③尹…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
C53②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5982 号

责任编辑: 张 菁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郑文卷

郑 文 著 尹占华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7 字数 266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226-04331-8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总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理学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要编一部《陇上学人文存》的丛书，他们把编选郑文先生学术著作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是先生首次招收研究生时的学生之一，又愚长一些年岁，且又一直在先生几乎终其一生的教书育人之地西北师范大学工作，此任务自是义不容辞。于是把先生恩赠于我的著作全部找出，再次拜读。先生于 2006 年仙逝，至今已五个年头，拜读之余，先生之音容笑貌及在陋室中伏案写作之情景，又在脑海中浮现。想墓石已旧，而聆教如昨，不禁恍然。

先生字天叔，1910 年生于四川省资中县。在家乡读私塾、小学、中学。1938 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不久中央大学由南京迁重庆。时黄焯（耀先）先生讲基本国文，伍叔傥先生讲历代文选，罗根泽（雨亭）先生讲中国文学史及《左传》、《汉书》、诸子，孙世扬（鹰若）先生讲文字学，徐英（澄宇）先生讲历代诗选，邵祖平（潭秋）先生讲词选，孙为霖（雨廷）先生讲曲选，顾颉刚先生讲古史，丁山先生讲古文字。先生云：得其教益最多、亦最为怀念者一为顾颉刚先生，二为罗根泽先生，三为孙世扬先生，四为伍叔傥先生。其余朱东润、孙为霖、乔曾劬（大壮）、徐英等先生，先生言亦受益匪浅。先生自谓：“余之学术渊源，一为章、黄学派之孙、伍二师，一为《古史辨》学派之顾、罗二师，至朱公、沈公，亦受影响。而在危迫之际，则受庇于孙公雨廷，并得闻大江南北故老之遗说而得启发。”（《金城续稿·自传》。本文引先生之言皆出此。）由此可知先生之学术渊源，并体现在先生的终生治



学之中。

1942年,先生于中央大学毕业并留校任助教,时王达津、蒋礼鸿与先生皆为国文系助教。1947年,先生离开中央大学应聘于江苏学院。1949年,江苏学院解散,先生至徐州第二中学任教。1950年,由吴玉章老介绍,先生入北京华北大学学习,旋合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同组有沈从文先生与孙道升先生。1951年,奉派往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执教,主讲中国古代文学。遂毕先生一生在西北师范大学工作。

先生为人正直,心口如一,遇事便发,拙于奉承,不谄谀之道,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然难免厄运。1956年因提出党政分开的意见,被划为右派分子,1965年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整,“文革”中遭批判,不待言也。直至1979年始恢复名誉与工资级别并允许发表文章,次年升为正教授并开始招收研究生,而年已七十矣。

先生一生以著述为生涯,学术著作以及诗赋作品,浩然难计。1945年,在重庆《妇女共鸣》杂志发表《从汉字中考见之古代妇女地位》,在《文史杂志》发表《〈文选·李陵答苏武书〉甄伪》,是为先生发表文章之始。其后在《国民公报》发表《陪都赋》、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释“兮”》等,遂一发不可收拾。惜因迁徙无定,新中国成立前之著作大多散失。解放后,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所著《王充哲学初探》,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先生所校点《六一诗话》、《白石诗说》,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所著《汉诗选笺》。退休之后,先生更是笔耕不辍,陆续出版有《楚辞我见》、《汉诗研究》、《建安诗论》、《李杜论集》、《杜诗繁诂》、《论衡析诂》、《扬雄文集笺注》等十余种。这些著作皆深见先生学术功力。无论质疑旧说、树立新见,还是钩稽考订、分析解说,都举证详实,切中事理,客观公正,见解独到。

先生于《楚辞》见解颇深,此与先生自幼研习骈文、窃好屈宋作品

有关,遂写有有关《楚辞》的论文多篇,《离骚槃诂》曾发表于中华书局《文史》第二十八辑。后将这些论文合编为《楚辞我见》。其后又将自编的用于教学的《楚辞讲义》名为《楚辞浅说》,收入《金城丛稿》一书。先生研究《楚辞》,所论大要有三:一、辨明屈原思想,既非儒法,亦异道墨,更非纵横,实为自家美政之思想。二、明章句。无论王逸的《楚辞章句》还是后人各种注说,皆有可议之处,故作《〈九章章句〉异议》和《离骚槃诂》二十三条。三、考辨事实、辨明作者,如驳《〈九歌〉作于汉代诸证》、《驳〈大招〉为屈原自招说》,并力辨屈原未曾放于汉北,都举证确凿,批驳得力,自是不移之论。

先生对汉诗的研究甚有功力,于汉诗研究成果卓然,斐声中外。有《汉诗选笺》与《汉诗研究》两书,实际上是对全部所存汉代诗歌的系统审定和全新定位。其中《论枚乘诗》发表于1979年《中华文史论丛》,《汉郊祀歌浅论》发表于《文史》第二十一辑。以往之评论汉诗者,偏于民间歌谣,而置朝廷乐章于不顾。先生爬罗剔抉、披沙简金,将汉诗中的优秀作品选出加以笺注,是为《汉诗选笺》。《汉诗研究》则是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汉代诗歌的学术著作,其中无论是对汉诗词采、义蕴、表现手法的具体考察,还是对伪托枚乘、李陵、班婕妤所作之辨析,还是对《汉郊祀歌》、《古诗十九首》之论述,皆新见迭出,不让时贤。

先生亦蜀人,故对扬雄情有独衷。先生自言:为学子时,曾从孙鹰若、伍叔傥两师受《文选》,于扬雄之文已留意焉。然因扬雄集的许多古本得之不易,故至晚年才撰成《扬雄文集笺注》。是书为集校集注集解性质,先引各家之注,再申以己见,釐正旧注之误,去伪存真,颇有新见。所引各家之注,较著者便有颜师古《汉书》注、李善《文选》注、唐五臣《文选》注、章樵《古文苑》注、韩熙祚《古文苑校勘记》、何焯《义门读书记》、胡克家《文选考异》、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张云璈《选学



胶言》、梁章钜《文选旁证》、王先谦《汉书补注》、吴恂《汉书注商》、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黄侃《文选平点》、陈直《汉书新证》等。各家之注散见于各书，先生将其集中于一处，故于研究扬雄作品者功莫大焉。先生认为：子云思深力盛，其《太玄》、《法言》于哲学、社会科学攸关甚大，其《方言》之作亦显训诂之位，非仅以能文为贵者。又总论扬雄生平及作品，作为本书的前言。是文先曾发表于《文史》第二十四辑。又有《扬雄思想研究》，为详细研究扬雄生平与思想的著作，收入《金城丛稿》一书。

先生先曾作《王充哲学初探》，确定王充哲学为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又有感于对王充《论衡》的研究有所偏执，又作《论衡析诂》，对书中每篇详加分析论述，以明王充思想之本意，体现王充哲学之成就。为了贯通全书，又综合各篇观点，依本体论、形神论、认识论、宿命论、政治论、文学论、教育论，而成《王充哲学研究》（为由《王充哲学初探》修改扩充而成），为全书之代序。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大学历史系集体所著《论衡注释》，是书与稍前流行的评法批儒运动有关，故空妄者多。先生此著实事求是，力求还王充这一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之本来面目。

建安诗歌亦为先生研究重点之一。先生论建安诗歌，不特着眼于“风骨”，而且着眼于建安诗歌的整体风格。先生认为：以曹丕为首的邺下诗风，思想意识开放，艺术表演手法创新，实已开齐梁之风，故影响后世甚巨，非仅“风格”一脉也。

先生于唐诗研究，于李、杜两家用力尤勤。共有论文论李白十四篇（十二篇收入《李杜论集》，二篇收入《金城续稿》）、杜甫七篇（五篇收入《李杜论集》，一篇收入《金城丛稿》，一篇收入《金城续稿》）。于杜甫，又专有《杜诗繁诂》一书。于李白，所论虽多系个别问题，如论李白诗中的伪作、李白天宝后期江夏零陵的行踪、李白归蜀、三入长安、流

放夜郎等问题,对于研究李白来说,却是甚有启迪意义。至于杜甫诗,先生说:“余治杜诗五十余年,理解渐深,发现遂伙。”遂著《杜诗繁诂》,几乎对杜甫的每首作品都做了仔细研读,钩稽考订,分析论证,计五百余条、近四十万字。分为训诂、时事、地理三纲,用意则在别真伪、辨题目、分段落、论沿袭、谈句法、议寄托、明旨意等。先生综合文史,论事说理,充分周到,说服力强,故此书实为研究杜甫者案头必备之书。

先生有感于晚唐温李并称,众多学者特垂青于李商隐,以成热门,温庭筠则寂寞焉。清代曾益等作《温飞卿诗集笺注》,然于温诗多所未及,且有讹误,于是有意做温庭筠全集的校注工作。此项研究虽始于20世纪50年代,然收拾定稿时先生已行年九十矣,体弱多病,目力不济,无法完成温庭筠全集之校注,遂简而为之《〈温飞卿诗集笺注〉补》。是书补正旧注之疏漏处,并考订温庭筠生平经历,总论温诗成就,还温庭筠诗歌创作之应有地位。故此书须与《温飞卿诗集笺注》合看。

后又将未编入专集之平生著述编为《金城丛稿》、《金城续稿》二书。曰“金城”者,以居兰州最久,兰州又名金城之故。《金城丛稿》包括国风韵式、楚辞浅说、扬雄思想研究、论文和札记、诗歌五部分。《金城续稿》则包括自传、诗歌、论著、笔记、鉴赏、荟萃及附录七部分。除所创作的诗歌外,余为小专著、小论文、读书笔记等。虽有些零碎,然亦不乏真知灼见,不时有思想的火花。先生一生以读书著文为最大乐趣,读书有得,则以笔录,故能积腋成裘。

先生选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则有《历代爱国文选注释》、《魏晋南北朝文选注释》,后者与女弟子单芳合编。此项工作可以说是为传播中国古代文学所做的普及工作。

先生所作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论辩之文。或曰先生好辩。的



确,先生阅读古代作品,一个文字、词语、地名、年代等,绝不轻易放过,必全面考查推敲而后酌定。又综合文史,广征博引,评判取舍,故能言之成理,令人心服口服。真理不辩岂能明哉?如果不论不辩,人云亦云,学问则何由谈起?这正是先生的治学特点,也正是先生的长处。先生自述治学态度与方法曾云:“首在创新,欲事创新,则须当仁不让,而有根有据,又为不让之本。至于措施,则在从实出发,理解本旨,故文字、声韵之学尚焉。”由上述已足见先生治学特点与性情胸襟。先生弟子赵维江在《国学耆宿一代良师——谈郑文先生治学育人之道》一文中将先生治学特色概括为:注重小学基础,夯实学术根柢;注重创作能力,提高鉴赏水平;注重文献考证,务必求实求真;注重文史哲兼通,拓展学术视野;注重吸纳新知,增强创新活力(《金城续稿》附录)。维江已将先生治学特点总结得十分全面而且周到,故于此不赘述。

先生诗也写得很好,《言志》说:“不久将过八九秋,寒门家世自营谋。承师指导识门径,凭己钻研入室周。廿载光阴曾枉掷,一心学术仍虔修。无如双目疲劳甚,所志未终尚待酬。”《金城续稿》以诗代序中说:“太上忘情我未忘,匹夫有责在兴亡。眈眈虎视欲先发,逐逐狼嗥肆更狂。多载艰辛勤学问,一生刻苦报家邦。诗歌自传明宗旨,论著见知研究方。”这些正是先生一生孜孜于学术研究的写照。

先生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书育人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事业,淡泊名利,操持自守。微薄薪金,除购书与自费出版外,所余无几。陋室粗茶,恬然自安。客人或弟子入门,唯谈学问,滔滔不绝。其性情真率如此。吾虽入先生之门,然较之先生之勤奋刻苦远矣,以此深感惶愧。先生遗言:死后将家中全部藏书无偿捐赠学校图书馆。先生逝世之后,周师母即与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办理了捐赠手续。先生与师母之胸怀开阔、磊落无私,于此亦足见矣。

先生之著述过六百万字。此次选编先生之文,就我的学术水平及

能力来说,也颇有一些难度,如何从浩瀚的文字中选出最能代表先生平生学术功力的著作,自非易事。是书所选十八篇,是否达到了上述目的,实亦未敢自信,挂一漏万当在所难免。忆及当年于先生面前聆教,每每言及学术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当是先生所深思熟虑的,故所编之文多属于此。

先生早期出版的《楚辞我见》、《汉诗研究》、《建安诗论》、《李杜论集》诸书,当时负责将文字输入电脑和排版的是某单位的打字社,文字及标点符号错误颇多,先生视力不好不能亲自校对,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也无暇多顾,故印成书后依然如此,先生云:“错落之多,大出意外,悔而无及,惟向读者致歉。”(《金城丛稿·楚辞浅说》附跋)此次选编,借重新将文字输入电脑的机会,遂将以前排印与校对环节所造成的错误尽量改正过来,也算对先前的遗憾做一点弥补工作。文章中的引文我也大多重新核对了原文,对排印中所造成的错误也予以改正。至于先生行文,自不敢妄动,固是一仍其旧。尽管如此,因先生原稿已不可觅,我想其中的错字仍然在所难免,望读者谅解。

书前先生影照,则为先生之女郑宇新女士所提供。

弟子尹占华谨序

2011年7月于西北师范大学寓所

目 录

编选前言	尹占华
读《〈屈原列传〉新探》兼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001
屈原未放于汉北的补说	012
驳《〈九歌〉作于汉代诸证》	021
驳《大招》为屈原自招说	045
《九怀》试探	059
论所谓班婕妤的《怨歌行》	067
驳《汉铙歌十八曲》都是军乐说	075
汉诗管窥(上)	109
汉诗管窥(下)	143
《扬雄文集笺注》前言	164
读扬雄《太玄赋》献疑	205
蔡文姬没于胡中论略	211
邺中文会及其诗风	227
《李白归蜀考》补正	249
李白三入长安的我见	258
试谈研究李白及其作品的几个问题	268
《杜诗繁诂》前言	281
《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臆测	310
附录:郑文著作目录	323

读《〈屈原列传〉新探》兼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文史》第一辑载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新探》一文,认为:“就今本《屈原列传》而言,由‘《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由‘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两段文字,都是后人割取《离骚传》语臆入本传者。”不但见解卓越,而且论证充实。

汤先生认为游国恩先生在《楚辞概论》中所举的下列三句: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不仅不能证明《离骚》是晚年的作品,相反地更足以证明它是壮年的作品。因为从这三句的语气看,凡两言‘将’,则所谓‘零落’、‘迟暮’、‘老’,显指将来而言。凡三言‘恐’,则分明是恐老之将至,而非言老之已至。”汤先生另外又举出三个例子: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证明《离骚》作于壮年而非作于晚年”。

汤先生所列游氏所举的三个句子的语气,虽指将来而言,但毕竟不是“三十曰壮”者所应有的语气,由此而认为《离骚》作于壮年,理由未免尚不充分。至于汤先生自己所举三个句子,我有下列的看法:

考《离骚》“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的前面两句是“溘吾



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合这四句看来，“荣华”正指前句的“琼枝”。由于它还没有衰“落”，因而他想折来赠给“下女”，并不是屈原自谓“荣华未落”，而想及时把自己赠给“下女”。“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的后二句是“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这四句都是巫咸向屈原说的。它的意思是说：屈原不但还没有老，而且时间很多，正好及时施展才学，建立事业，否则被群小抢先执政，那就困难了。这正是从上文“勉升降以从俗兮，求渠纍之所同”的意思中进一步敦促屈原迁就环境，合光同尘，而不是屈原说自己年事尚轻，来日方长。至于“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洪兴祖补注：“‘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所谓‘余饰之方壮’也。”马茂元氏说：“‘壮’即前‘不扶壮而弃秽兮’的‘壮’。‘余饰方壮’与前‘佩缤纷其繁饰兮’意同。”他们的解说，和上二句“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以求女”正好吻合。因“方壮”就余饰言，不是就“余”言，亦即与上句的“和调度”同指屈原自己身上所佩的玉器而言，而不是就屈原而言。虽然，就象征手法说，是屈原用它们来象征自己，但就此以为证明《离骚》是屈原壮年作品，似乎还可以商榷。

考司马迁叙上官大夫进谗，只以屈原“伐其功”。这虽然是他的缺点（如果真如上官所言的话），但不是他犯了罪过。所以怀王也仅疏远他。下文叙怀王被张仪所欺，明白指出：“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也仅仅说屈原“既疏，不复在位”，而且还提任外交官出使当时富足而能与秦、楚争雄的齐国。《楚世家》记载这一段史实与《屈原列传》相同。《张仪列传》虽言怀王不听屈原的话，“卒许张仪与秦亲”，但屈原这时居可言之地，三篇记载都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屈原虽然不复在执政之位，仍然留在朝廷，谏言有时也被采纳。因此，《离骚》中所表现的激昂愤激的情绪，和他这时所处的地位不

称,也就是《离骚》不是这时创作的。这是一。

又考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楚与齐、三晋虽曾“击秦不胜”,但怀王这时身为从长,在国际上是很有地位的。《九章·惜往日》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嬉。”司马迁所谓“王甚任之”大致就指的这个时候。不久之后,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由这样史实联系到《离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只是心怀恐惧,而且居安思危,也是像屈原这样的“贞臣”所应有的态度。但就《离骚》整篇精神看来,这种恐惧和当时楚国不利的处境,是密切联系着的。如果在屈原被疏之后不久,似乎不易有这样的设想。这是二。

由是可知,在怀王为众长时,屈原年事尚轻,但被信任,张仪欺楚时,屈原也不过三十来岁左右。但他在《离骚》中,一则曰“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再则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三则曰“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一个三十来岁的壮年之人,怎会有“迟暮”、“老将至”、“年岁不吾与”之感呢?除非身患特别严重的疾病。这是三。

屈原在没有被疏以前,“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且“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到了被疏之后,“怀王贪而信张仪”,改变了合齐的外交政策。怀王二十年(公元前209年),虽曾合齐以善韩,二十四年(公元前205年),又背齐而合秦,楚国外交路线摇摆于齐、秦之间,固然是当时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反映,也是楚国内部矛盾尖锐而频繁的反映。《离骚》说:“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联系上述史实,才有它的具体内容。如果屈原仅仅由于“伐其功”的缺点而被疏,而且自己还留在朝廷,谏言有时也被采纳,便“伤灵修之数化”,竟